

在敌人的刀刃下

寻找反酷刑的无政府主义做法



在敌人的刀刃下：寻找反酷刑的无政府主义做法

原文为英语

Under the Enemy's Blade: A Search for Anarchist Practices Against Torture

No Trace Project

2025

简体中文（普通话）翻译

iYouPort

iyouport.notion.site/S07E05-24c34ca2d46d808985a0f63a22dde6c7

新版本

些微编辑和补充燀空（minor edits and additions: jyun kong）

排版

No Trace Project

notrace.how/resources/cmn-Hans/#zai-di-ren-de-dao-ren-xia

目录

序言	3
无痕计划	
跪地之时	4
巴赫曼	
不放弃，不出卖：关于酷刑和证词	6
德米特里·彼得罗夫与同志	
如何承受酷刑	15
匿名	
酷刑下的抵抗分析	20
阿什拉夫·德赫加尼	
“对我而言，践行‘萨穆德’就是存在本身”	25
里亚德	
冷热交织	27
内森·吉尔伯特·金波	
为何我们处决了姆潘帕利斯	38
1978 年 6 月	
“但谁配活着？”	40
阿尔弗雷多·博南诺	
“这是一场冷酷的欢迎”	43
安德烈斯·特索帕斯特莱·特克皮莱，约翰·吉布勒	
后记	46
无痕计划	

序言

酷刑——即为惩罚、审讯或恐吓而蓄意施加的剧痛或折磨——是国家及其盟友在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战争中常用的手段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应采取哪些个人与集体策略来防范、抵抗并反击酷刑？本文集旨在通过分享过去五十年间遭遇酷刑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其他激进派反抗者的经历与洞见，为解答此问题提供参考。

酷刑是我们运动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如何防范酷刑风险？如何组织行动以确保有同志被捕受刑时，其他同志及运动/行动本身的风险能降至最低？我们是否应承诺在酷刑下绝不供述？当遭受最残暴的肉体与精神折磨时如何保持沉默？如何对待难忍酷刑而选择供述的同志？如何反击施虐者？如何帮助酷刑幸存者应对痛苦与创伤？

我们竭力甄选能帮助同志们当下解答这些问题的文本，无需依赖国际法的强制执行或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游说。每篇文本前均附简短导言，介绍作者及原文发表背景。部分文本包含酷刑行为的直白描述。

谨向文本作者及使这些作品得以收录于本集的译者们致以诚挚谢意。

无痕计划（No Trace Project）

跪地之时

《跪地之时》是伊朗男子巴赫曼所作，其以笔名活动，身兼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与诗人三重身份。

巴赫曼在伊朗监狱遭受了七年残酷的酷刑，后逃亡加拿大。这首诗即写于流亡期间，英文版刊载于2014年论文《诗歌抵抗：见证巴赫曼对抗酷刑与政治暴力的抗争》。该论文阐释道：

“巴赫曼自幼梦想赢得奥运奖牌。他坦言，重拾儿时渴望正是其抵抗策略之一。巴赫曼最终得出结论：‘若我能保持沉默，若我拥有不泄露任何人名力量与意志，这便堪比一枚金牌。’[……]

为揭示巴赫曼的抵抗行为，需详述其遭受酷刑的具体经过。某次刑讯后，尽管他再次拒绝向施刑者提供任何人名，仍被拖回牢房，双手反铐悬吊八天。解开枷锁时他已无法站立，身陷剧痛。如同每次酷刑体验，巴赫曼不知自己能否挺过下一轮折磨，更无法预知能否再次守住沉默。巴赫曼希望读者明白：下文这首诗绝非隐喻。”

当时我
跪倒在地
双脚肿胀
精疲力竭
渴求睡眠
当时他们
气势汹汹
我是那片战场
的胜利者
我的武器是沉默
我是冠军
没有观众
没有见证
但我的奖赏
远胜金牌
我的奖赏
是朋友们
安然无恙

不放弃，不出卖：关于酷刑和证词

《不放弃，不出卖：关于酷刑和证词》原文为俄语发表于 2021 年，文尾签菲尔·库兹涅佐夫与同志。

菲尔·库兹涅佐夫是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彼得罗夫的其中一个暱称。德米特里在 2000 年代加入了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运动，参与了许多在俄国和国外的行动，也共同创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战斗组织（БОАК）。2022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自愿参乌克兰武装部队，2023 年在战中阵亡。

以及简短报告国家在当代俄罗斯对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的酷刑，本文试图提出酷刑下“张口”的道德评估，评估面对肉体或精神的残酷对待时为国家供出有用情报的行为。

导言

自 2017 年以来，我们所处的这场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残暴镇压，范围和强度都达到了历史之最。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FSB 对酷刑的大规模使用¹。以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遭受殴打和酷刑的案例，大多属于孤立事件。我们曾听闻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有些人可能还记得针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敖德萨案”²。但是，“抽象地知道”是一回事，“亲身经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酷刑导致许多人在落入特工部门手中后，被迫指证自己的同志，跟镇压机器合作。

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运动当前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旧有分裂和残酷镇压的结果。也许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源于酷刑、泄密、以及背叛，所带来的道德困境，而我们至今仍未能充分应对。

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在被审讯过程中许多人背叛同伴的局面？酷刑可以成为辩解的理由吗？当运动中广受欢迎的成员，比如“网络”案中的伊戈尔·希什金³，最终也被联邦安全局击垮，成为了叛徒，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不容回避。因为归根结底，它们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否还具有实际意义？它的存在是否还有价值？

酷刑和背叛的问题是近年来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重要伦理困境。不解决它，我们就无法继续向前。

在无政府主义圈子里，可以听到的评判光谱始终在两种极端立场间摇摆，一种认为：“任何人在酷刑下所做出的口供都不应被追究责

¹无痕计划注：FSB（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是俄罗斯主要的国安机构。

²无痕计划注：在 2002 年，11 名——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乌克兰被捕和被指控参与在敖德萨城市之中或附近行动的犯罪组织。刑案后来被称为“敖德萨案”。他们全都被乌克兰安全局（SBU）折磨。一名在酷刑之下死亡。剩下大部分有作证而且虽然有证据他们的证词是在酷刑下取得的还是被法庭接受。余生的 10 名被判处 3 到 14 年监禁。

³无痕计划注：在 2017 年底和 2018 年初，大约有十名在俄罗斯被捕和被指控参与名叫“网络”的地下组织，据说在 2018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和国际足协世界杯的预料之下计划攻击。他们大部分在拘留最早的阶段都被 FSB 折磨。

任”、另一种则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向敌人提供情报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这样做的人都是叛徒，是告密者，是线人”。

剧透一下：真相绝非是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更接近第二种主张，但并非完全等同。让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

原则从何而来？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告密是不可接受的”。但这是为什么呢？

尤其是在面对酷刑时，如果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向施刑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以换取停止痛苦，无疑是最容易的选择。

然而，我们有几个理由说明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最低限度是：当人们开始集体参与可能招致国家镇压的行动时，他们就已经期待了共同的秘密能得到保守。泄露这些秘密就是对这种信任的背叛这毫无疑问。如果事先知道在危急关头，同伴会把一切都告诉警察，那不难想象几乎没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但更强有力的理由或许是另一个：向敌人提供信息，实际上会毁掉其他人的生活。这些人很可能对你来说并非陌生人，你对他们有所了解、有过深刻的交集。而由于你的行为，他们也将面临酷刑和多年的监禁。

显然，这些论点同样具有相对性。事实上，如同任何道德准则一样，不出卖同伴的原则无法完全被“理性化”。但是，集体的传统、文化和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原则是正确的。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道德感”在指引我们⁴。

同样基于此，我们将集体的责任置于个人的舒适之上。更何况，这些承诺没有“保质期”：就算某人幻想破灭，离开了运动，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在警方压力下供出了他们的“前”同伴，这种过错并不会因此减轻。

所以，我们将此视为一项原则：向敌人提供任何有关其他人的真实信息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既然违反这一规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么这种违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重大过错。剩下的唯一问题是，酷刑或其它因素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减轻罪责的情形”？

⁴无痕计划注：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一位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和地理学家。在他的传单《无政府主义的道德》（1897）之中，他论证人类的道德，我们的“道德感”，是天生的，是“我们拥有的天然官能，类似嗅觉或触觉。”

过去并非更好

诚然，我们能列举运动成员在镇压面前向当局提供重要情报的先例。2010 年的事件尤为鲜明。当时，无论是在俄罗斯（金奇市市府遇袭事件后）还是在白俄罗斯（一系列直接行动袭击事件发生后），无政府主义运动几乎同时遭遇镇压。据我们所知，当时酷刑仅在极少数个案中使用，其残酷程度也低于我们自 2017 年以来所见的案例。然而，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有人最终与警方合作。在所有已确认的案例中，社群都对告密者进行了谴责和驱逐。

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的“集体意识”所遵循的原则是：在面对威胁、恐惧和心理操纵时，供出同伴的行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这种立场是难以辩驳的。无论你正受到威胁，还是审讯者正在扮演“好警察”的角色，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敌人。我们有义务不向敌人提供任何关于我们的同伴的信息。

即使是一个年轻的、刚加入运动不久的新成员受到警方施压，人们也期望此人在加入激进社群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预设道德准则，而其中“绝不出卖朋友”的原则应当是首要的。虽令人遗憾，但近年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重申这一点。十年前，无政府主义圈子里根本不存在对告发同志持宽容态度的问题。过去并非更好，只是更容易。总结来说：在言语和心理胁迫下向国家提供情报显然不可接受。但如果是肉体酷刑呢？

革命者的经验

翻阅过去革命组织的文献，我们很难找到针对酷刑下口供的具体态度。“人民意志”⁵ 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只是简要规定，要将组织的所有秘密深藏不露。

卡洛斯·马里盖拉的《城市游击队迷你手册》⁶ 也仅用简短一行未作细述地指出：“那些主动向警察告发、指控、提供情报、和指认同

⁵无痕计划注：“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是 19 世纪末在俄罗斯帝国行动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处理官员的暗杀。

⁶无痕计划注：卡洛斯·马里盖拉（1911-1960）是一位巴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分子。他创建了城市游击队 Ação Libertadora Nacional（民族解放行动），

伴的人，一旦被城市游击队抓获，必须予以处决。”有意思的是，在描绘马里盖拉及其同伴斗争的电影《九月四日》中，角色们毫不怀疑他们被捕的战友会在酷刑下供出情报。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将他解救了出来。电影毕竟是电影，现实情况如何，作者不得而知。

爱尔兰共和军的《绿皮书》⁷花费了大量篇幅进行心理准备，以应对逮捕、审讯和殴打，帮助游击队员保持沉默。然而，文本并没有直接对酷刑下的供词进行道德评价。而且，《绿皮书》中提到的酷刑仅限于殴打和烟头灼烧。电缆连接生殖器和长时间电击枪电击的手段或许超出了 1970 年代北爱尔兰的现实范畴——当代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特勤警察的酷刑手段则更为残暴。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证的原则，与其说是明文规定，不如说是革命运动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是一种被默认的不言而喻的共识。

二战期间的苏联，游击队员和地下战士无论遭受盖世太保何种酷刑，出卖战友都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⁸。例如，“青年近卫军”（苏联在德占城市克拉斯诺顿的地抵抗组织）的政委维克多·特雷蒂亚科维奇，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有人怀疑他在被处决前未能经受住酷刑，向纳粹供出了名字和地址，尽管这一说法被许多人反驳。

有人认为，落在“专业审讯者”手中，没有人能经受住酷刑。这种观点并非毫无根据，但它不是事实。有许多文件记载了前辈们忍受可怕酷刑仍坚守信念的例子。下面就是一个。

左翼社会革命党成员鲍里斯·顿斯科伊于 1918 年在基辅刺杀了德国占领军司令赫尔曼·冯·艾希霍恩。鲍里斯在行动现场被捕。他的战友伊琳娜·卡霍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被带到监狱后，立即被绑在床上，遭受酷刑，要求他供出同伴。他们折磨了他三天，轮番上阵：他们烧、刺、割，将大头针和铁钉捅进指甲缝，拔掉了他所有的脚趾甲 [……]”顿斯科伊只说了他自己的姓名、籍贯、党派归属和行动动机。关于战友的信息，他一字未提。他的“口供”实际上变成了一份政治声明。

对一连串银行抢劫和绑架负责。1969 年，在过世不久之前，他写了《城市游击队迷你手册》。

⁷无痕计划注：《绿皮书》是爱尔兰共和军（IRA）发给新志愿者的培训手册。

⁸无痕计划注：盖世太保是纳粹德国和德占欧洲的秘密警察。

这样的例子绝非孤例。

如何抵抗酷刑？

每一个经历过酷刑，甚至只是在警察局遭受殴打的人，都深知那是多么可怕、痛苦和羞辱。也深知要做到不屈服、不给施刑者他们想要的东西，有多么困难。

施虐者的目的是摧毁你在道德方面的意志。于是应对的关键在于保持清醒意识，根据情境灵活应对佯装恐惧，夸大肉体痛苦，或以其他方式迷惑施虐者。

抵抗酷刑的方法是我们几乎从不公开谈论的话题。公开可说的仅有：当痛苦难以承受时，编造一个不涉及真实人物和信息的虚假事件版本或许能起作用，将这个故事“固化”在脑中，让自己相信其真实性，并在受刑时坚持讲述这个版本。

但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保持沉默。

阿扎特·米夫塔霍夫（Azat Miftakhov）⁹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有效的行动方式。当条子开始对他施加酷刑时，他自己割伤了手腕（非致命的横切），迫使施刑者不得不停止施行并呼叫医生。

纠问式应对方式错在哪里？

我们坚持认为向镇压机关出卖同伴和泄露情报永远不可能是“正常的”或“可以接受的”。酷刑的情况也不例外。运动和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原则只能是：宁可遭受酷刑、坐牢甚至死亡，也不能背叛同伴，不能向敌人提供重要信息。

当你听到有人说“酷刑下的证词无需负责”时，你会对这个人失去所有信任。你会意识到只要轻轻一巴掌就足以让他们全盘托出。将此类态度奉为圭臬的运动永远无法吸引并培养坚韧的成员。没有坚韧的人，就不会有激进的变革。

⁹无痕计划注：阿扎特·米夫塔霍夫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2019年被捕，被指控制造了爆炸装置，在羁押期遭受酷刑。

但是“任何提供信息的人都是叛徒”这一立场又错在哪里呢？是的，抵抗酷刑是现实可行的。但很明显，即使是那些愿意抵抗的人，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任何没有亲身经历过残酷酷刑的人都无法保证自己在那种情况下的行为。

那些曾经一度抵抗了施刑者但在真正残酷的肉体压力下最终还是屈服供述者，很难再继续做我们的同志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尽管，当然，每个案例都必须单独考虑）。但是将这样一个人轻易地定性为叛徒，并认为他们理应遭受报复，这公平吗？可能不公平。

这一论点不应与容忍供出同伴的行为相混淆。供出同伴永远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尽一切可能，甚至付出更多代价为了保持清白，是每个人的责任。

杜波夫斯基案

白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游击队成员德米特里·杜波夫斯基（Dmitry Nikolaevich Dubovsky）的行为在运动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此案虽不涉及酷刑，但既然我们在讨论招供和屈服于审讯者的问题，就不可能忽略这个最近的例子。

否认杜波夫斯基在录像调查程序中言辞过多，详细描述了成员站位及汽油瓶交接过程，实属愚蠢。当局和公众本无需知晓这些细节。但他的解释，与战友事先约定若遭拘捕则不否认行动，以此作为政治宣言，完全值得采信。若非如此，该组织的其他成员早就站出来否认了。至少在其他成员对情况发表评论之前，谁又能更清楚呢？

也许德米特里，出于困惑和错误判断，未能完全履行约定。有些人急于给他贴上“告密者和叛徒”的标签，也就是说，对一位革命者最严重的指控。此举恰是上述“纠问式”思维的典型体现。欲如此污名化他人，需有充分依据，而本案中我们并不具备充分依据。

总的来说，此案凸显了一个棘手问题：法庭如何成为政治讲坛。这在革命史上实属经典实践。审讯与庭审中的言论可成为强大的革命宣传手段，但前提是，必须公开表明立场，甚至可能需要部分行动配合。

核心问题是被囚同志的行为究竟是为在狱中开展宣传呢，还是为保全自身而为。

评判标准可以是：供词是否导致了新的逮捕、是否暴露了运动的内部运作、是否恶化了其他囚犯的命运，同时减轻了供词者的处境？这些声明是否有助于宣传行动背后的理念？此外，在集体被捕的情况下，其他被捕同志的同意至关重要——在此类关键事件上独断专行是绝不可取的。

根据所提出的标准，没有真正的理由指控德米特里·杜波夫斯基犯有叛国和告密罪。

再说几句

酷刑问题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酷刑的现实使我们通过个人的感官体验，而非抽象的言辞世界，认识到国家及其代表是我们的真正敌人，他们残酷而卑鄙。我们必须严肃而有力地与他们战斗。

其二是：运动必须保护自身免受叛徒的侵害。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场严肃的斗争，那些主动向镇压当局提供大量情报、并在后续调查中予以证实的出卖者，必须承受报应，正如革命尚未沦为虚饰的年代里对类似事件的处理那样。迄今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尚未严肃探讨此问题。将报复机制纳入无政府主义运动体系是我们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尽管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结论

当代文化提倡为软弱辩护。仿佛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展现勇气和其他非凡品质而是崩溃放弃，是一种“神圣的人权”。

仁慈的态度与对能力边界的理解固然必要，但为软弱辩护是恶性的且明显具有破坏性。

诚然，要求在酷刑下拒绝作证需要非凡的坚韧，但这种要求植根于我们的文化，自童年起便伴随我们成长。

此刻，软弱的权利不再适用，展现内在力量的义务才真正具有意义。



德米特里·彼得罗夫，2018

如何承受酷刑

以下证词来自一位数年前在俄罗斯遭受酷刑的匿名同志。文章基于该同志的亲身经历，描述了承受酷刑的策略。该文于 2019 年发表于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网站 Anarchy Today (a2day.org)。

先谈谈我的政治观点。我认为社会组织形式应当造福全体民众，而直接民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近来我未参与行动，因为我意识到必须从自身生活方式做起。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手，使其更直接，学会集体开展共同工作。

遭遇酷刑时我猝不及防，从未料到竟有人会出于某种原因对我施以酷刑。当然，唯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会，但我仍想分享一些反思。我认为以理性方式探讨酷刑具有现实意义。我衷心希望无人陷入类似境地，但事实表明此类事件比想象中更近在咫尺，且如果阅读本文者不幸遭遇困境，但愿以下所述能助其以最小代价脱身。不过我并非此领域专家，结论主要基于个人经历，而任何经历都具有个体性，未必适用于其他情境。

需注意的是酷刑的目的可能各不相同。若不幸遭受酷刑，对你而言最乐观的情况或许是：警方对你个人毫无或几乎毫无证据，他们施刑只是为了获取你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信息及相关线索（这正是我个人的遭遇）。这些嫌疑人本身已受到严重怀疑，警方必然对其进行过跟踪调查并有所发现，或许警方意图调查其所有熟人以期有所斩获，但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具体要找什么，这为我们留下了周旋空间。如果警方怀疑你本人，情况就糟糕得多；他们会篡改任何他们感兴趣的事实，你将面临更严酷且更持久的施压。若警方已准备将你收监，只需你的供词，情况亦是如此。

我将重点阐述遭受酷刑时面临的挑战，以及帮助我部分抵御酷刑的因素。

当然，首要挑战的是肉体痛苦。当酷刑持续不断施加时，它会变成巨大的精神重压。人虽能短暂忍受，但终将逐渐说出他们想听的话，做出他们想看到的举动。某一刻你会想发疯，不在乎生死。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立刻放弃。施刑者也有弱点——他们同样会身心俱疲，即便威胁折磨会持续到他们满意为止。若几小时内未见预期效果，他们可能厌倦折磨你，轮班结束就想睡觉。你只需耐心熬过这段时日。还有什么方法？不妨将疼痛与不适视为纯粹的思想，不过是身体细胞发出的神经信号流。当你如此理性认知时，痛苦便不再难以承受。建议在日常遭遇不适时就进行这种心理训练。

还有心理层面的因素。完全受制于他人的感觉极其压抑，如同屠宰场里的牲畜。努力保留哪怕一丝控制权至关重要，要将现状视为抗

争，而非猎食关系。将头部反复摩擦地板直至疼痛，能让我稍感宽慰，既保留了行动自由的微弱感知，又能掩盖痛楚带来的影响。割腕自残虽更极端，却也是解脱之道，但切忌过度，况且环境未必允许。当施虐者以强奸威胁相加时令人毛骨悚然，这迫使我们思考为了避免泄密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记住你的战友们，此刻此地很可能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未来数年的生活。几小时的痛苦，就算是极度，是否值得换取他人数年，甚至超越数年，的自由？

关于在压力巨大、令人恐慌的条件下开口说话的必要性，有几点需要说明。我遭受数小时不间断的酷刑时几乎无法思考。同样的问题被反复追问，但你必须开口，且所言必须尽可能保持稳定和逻辑性。警方在抓捕前很可能已经长期监控你了，追踪你的网络流量、手机基站定位记录、通话及短信内容。因此他们掌握着你生活的诸多细节。你必须学会如何解释这些已知信息，且陈述内容需与事实高度吻合，而编造既合理又自洽的复杂谎言极其困难。但一旦选定说辞，就必须始终如一。与其向审讯者提供矛盾的说法，不如装傻。更理想的做法是提前准备好无懈可击的掩护故事，并让所有相关人员统一口径。当然并非人人适用，但最可靠的不在场证明莫过于过着平凡生活——工作、学习、培养多元爱好，手机通讯录存满非政治人士的号码，社交媒体主页充斥萌猫照片等。这种策略有诸多益处包括当你承受压力时，无需编造任何内容，只需向警方如实陈述，就能证明你本质上是普通人。宜多谈些无关紧要的中性话题，用看似相关但对警方不重要的信息拖延时间，同时避免损害任何人的声誉。若对方执意追问姓名地点等细节，可随意编造，但关键在于避免被构陷为“不明身份者”参与犯罪的唯一嫌疑人。另一种策略是装疯卖傻说些毫无逻辑的话，不过这需要点表演天赋。最后谈谈压力应对：根据我的经验，我会努力保持冷静，像旁观者般审视现场，将发生的一切视为梦境或低成本恐怖片拍摄——否则我的大脑恐怕会拒绝感知这些事件。

如何避免泄露重要信息？首先，极其有益从一开始就不要去了解不必要的信息。“知之愈少，眠愈安”，此言不虚。大量信息难以保密，在没有实际必要时试图获取敏感信息亦非明智之举。重要信息应仅通过加密设备在相对安全的场所访问，所有关键密码都应存储在密码管理器中，无需查看。通信可采用 Jabber 配合 OTR 加密，或在

安全服务器上使用 PGP 加密邮件。但你需要提前做好使用加密的合理解释。

遭受酷刑时完全可以隐瞒部分信息。例如我坚持原则不透露无关姓名，不诋毁任何人，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同样遭受酷刑。由于警方并不知晓我实际认识这些人士，他们不久后便放弃了逼供。

我们珍视的事物都可能沦为条子勒索我们的筹码。失去所爱、挚友和亲人、荣誉和自由、乃至生命，皆令人痛彻心扉。但须谨记那些以剥夺上述任何事物相威胁者，即便你屈服，他们照样能轻易实现目的。若你已完全受制于人，便再也无法守护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最荒谬的莫过于相信将你逼入绝境之人的承诺。更别以为生命本身具有非凡价值，许多人会为达成目的甘愿牺牲它。

警察或许会虚张声势声称你已被举报，否认也无济于事云云。诚然，任何工作中都需要信任合作对象，而若对亲密伙伴存疑却仍携手重要事业，实属愚蠢行为。建立足够的信任与默契往往需要漫长时光，有时甚至需经年累月。对于完全信任之人，否则绝不能认定其背叛，除非有遭受酷刑逼供，但那样是不同的情况。如果参与由互不相识者组成的大型团体活动，则必须预设部分成员会主动或被动向警方泄密，因此必须构建团体运作机制以最大限度降低此类风险。

理解施虐者的心理并向其传递符合其价值观的信息也很有帮助，试图寻找共同点。例如，诉诸上帝的报应，认同乌克兰的那些“班德拉分子”¹⁰ 确实太过分了，并以“我不需要这些革命，我有其他事情要操心——盖房子、买车”等理由反驳指控。

遭受酷刑后令人恐惧。当然，我绝不会在不看内容的情况下签字，但我的意志显然已被削弱，非常害怕酷刑会重演。获释后，这种恐惧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害怕独处，更不敢上街。最初阶段，值得信赖的人陪伴在侧至关重要，他们能协助解决住所及其他所需事宜。同时应备有律师联系方式、媒体联络渠道、有效护照签证及备用通讯设备。我认为事件发生后应立即记录伤情并公开案件。创伤中心会即时向警方通报信息，这可能无益于案件处理，因此最好直接找私人法医鉴定。媒体曝光虽非防止酷刑重演的万全之策，但警

¹⁰ 无痕计划注：班德拉分子原本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派别成员的名称，在二战时期行动。在现代俄国之中，其是用来称呼乌克兰 2013-2014 年迈丹起义的积极分子，总称乌克兰人支持从俄国取得主权的贬抑词。

方极可能不愿再次引发关注，这有助于让他们不再骚扰你，而无人关心的受害者则可能遭受无限期折磨。不过，此后继续留在俄罗斯生活仍属危险之举。

最后说点个人感受。酷刑这种事的影响力极其强大。我不会说在此之前对人性怀有幻想，也不会说经历之后不再爱人，或许正是这些特质让我相对容易承受酷刑。然而我内心确实发生了变化，或许是对自身痛苦与他人痛苦变得更为敏感，但这种感受也变得更自然了。从内在而言，很难判断这些变化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简言之，酷刑不过是掌控者手中的又一工具。无需对此惊惶失措，但必须认清其运作机制并思考应对之道。愿酷刑的威胁不会阻碍你们追求个人与集体的梦想，更愿你们无人承受酷刑之苦。若有人不幸遭遇，愿你们坚韧不拔，坚信自身力量！

酷刑下的抵抗分析

《酷刑下的抵抗分析》由阿什拉夫·德赫加尼于 1970 年代初撰写，作为其狱中回忆录《伊朗的酷刑与抵抗》中的一个章节，该书于 1976 年被译成英文出版。

阿什拉夫·德赫加尼（1949 年生）是伊朗共产主义武装分子。1971 年她加入地下游击组织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OIPFG），同年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屡遭酷刑折磨。从始至终抵抗残暴对待，未向施刑者透露任何敏感情报。1973 年越狱后重返 OIPFG 组织。1979 年伊朗革命推翻伊朗帝国政权后，当部分同志放弃游击战争时，阿什拉夫·德赫加尼组建新组织（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IPFG）继续对新政府进行武装斗争。据称她后来移居欧洲，现下落不明。

能够帮助同志抵御酷刑的因素可概括如下：

1. 对革命道路正义性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必须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即便在极端情况下所有同志都背弃斗争时，它也不会动摇或减损。没有对我们所奋斗的理想坚定信念不可能抵抗酷刑以及敌人的一切诡计。
2. 对敌人的憎恨与对战友的热爱：这些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成为战士整个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我而言，想到自己竟可能因泄露姓名而让另一位战友承受我正在经历的酷刑难以想象。怀着对战友的深情与对敌人的无尽仇恨，我怎能成为将战友送入刑讯室的帮凶？目睹他们受刑的痛苦，远比我自已承受的折磨更令人煎熬。如果我心存任何其他念头，便是对所为事业的彻底背叛。为逃避酷刑而将战友出卖给刽子手，意味着要承受终生的精神折磨，我绝不接受。况且，向可恨的敌人投降，于我而言等同于憎恨人民。敌人以为我们举起武器是为了谋取高位。而我深知，我战斗是为了将人民从剥削者的魔爪中解放出来。向敌人投降意味着我背弃了人民，放任剥削继续肆虐；意味着我参与了整个骇人的剥削勾当。毕生淬炼使我憎恶一切剥削者；想到自己竟可能顺从其意，便觉恶心反胃。难道此刻我竟能忘却身陷枷锁的同胞？那可是我始终怀着深情厚爱的人民。敌人的罪行如此真实昭然，令我难以视其为人类，故投降念头从未萌生。
3. 从历史的视角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角度审视全局。从辩证法角度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实现，抵抗与革命胜利之间都存在着必然联系。短期而言，我们的抵抗或许能挽救同志免遭敌方俘虏或阻止对组织的袭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抵抗精神，这种拒绝投降的意志，正是迈向革命最终胜利的步伐。若孤立审视这“一步”，它或许微不足道，但切莫忘记无数同志正以同样方式进行着抵抗。试想所有抵抗的累积效应，便会明白退缩“一步”、放弃抵抗即是背叛革命。因此，以正确视角审视全局，将增强我们抵御酷刑与敌方诡计的抵抗力。
4. 对付现实的客观方式。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能够使我们以应该的客观性对付现实。就酷刑而言引发恐惧、丧失斗志和抵抗精神的根源，与其肉体伤害无关，主要在于人们对其形成的普遍主观认知。这种认知更因 SAVAK¹¹ 关于酷刑的蓄意宣传而被放

大。但若客观审视，酷刑这桩龌龊行径便会失去实质意义。归根结底，酷刑之下最严重的不过是死亡，这对革命战士而言并非难题。心理折磨确实会影响那些无法保持客观的人。例如当他们剥光我的衣服时，我这样分析赤裸的腿与赤裸的手并无区别，因此拒绝为此动摇；又如当手枪枪口抵住太阳穴恐吓时，其最终的物理效应不过是颗致命子弹，既然我为事业赴死毫无畏惧，这显然毫无意义。因此，客观分析事物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以更强大的力量直面敌人。

5. 对敌人必须永远地绝对地不信任。敌人对俘虏所作所为的动机只有一个：迫使战士吐露机密，从而削弱革命运动。仁慈、酷刑、威胁、虐待、各种背叛者抛弃理想的故事，皆为此目的而设。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面对敌人，对其行为保持怀疑，无论看似重要还是微不足道。忘记这一点将致命。拒绝接受敌人的善意举动至关重要。孤独、持续的折磨与精神消耗，正是滋生妥协的温床。敌人的善意举动背后暗藏险恶。稍加抵抗便能揭穿其真实意图也能坚定战士的意志。
6. 对“自由”与“囚禁”等词汇的正确而哲学性的理解：在酷刑与锁链之下，我始终感到自由——这确是真实的。保守主义的念头从未阻碍我用自己选择的语言表达对敌人的憎恨。我已为信仰事业奉献一切，此刻唯余信念可守。我深知施刑者完全依赖于卑微可耻的日常琐事。这份认知成为我的力量源泉。我坚信作为人民的战士，审判者应当是我；主宰者应当是我。倘若屈服于他们，便等于彻底暴露自己的无能。我深信我的信念与追求远非他们所能理解。这种身陷囹圄却无所不包的自由感增强了我的抵抗力量。
7. 对敌人手段的预先了解：必须研究其他同志应对敌人诡计的经验，以便予以化解。例如，敌人试图找出某人的弱点并加以攻击。战士只需拒绝暴露弱点即可。又如，敌人精心编排一组常见且无用的数据，企图向战士施压，使其相信敌人无所不知。战士事先知晓了此敌方伎俩，便能识破其意图，保持镇定自若。
8. 对人类意志力的坚定信念：只要有意识地强化这种信念，敌人那些关于催眠术、注射药物、强行灌服某种据称能在囚犯

¹¹无痕计划注：伊朗情报安全局（SAVAK）是伊朗帝国的秘密警察。阿什拉夫·德赫加尼被 SAVAK 折磨。

睡梦中迫使其吐露秘密的药剂的花言巧语，便会失效。反复灌输信念在抵御痛苦方面尤为有效。因此，在遭受酷刑时，我曾长时间感觉不到疼痛。当酷刑持续延长时，我才迫切渴望结束。然而纵有此念，我从未感到意志动摇，因我深知痛苦终有尽头——死亡。在死亡降临之前，我决心挺直脊梁。因此，是否招供的问题从未构成实质困扰。需在此说明：在日常生活中，贝赫鲁兹¹²同志与我始终致力于反复灌输信念的力量。

9. 想到其他战士的顽强抵抗和他们勇敢对抗敌人的姿态。世界运动史中处处可见战士们史诗般的抵抗；伊朗人民的斗争史亦是如此，尤其近些年更是如此。这可以成为所有真正战士的力量源泉。

当然，以上提到的因素可能以负面的方式被展现出来：例如，对敌人的憎恨不充分；把运动视为短暂的事件并且未意识到其历史上的重要；信任敌人以宽容的方式对待他；对自己的意志力缺乏足够的信心；这些都是可能让战士士气低落的因素。

况且，未由完全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弱点和拒绝自我批评，未对付自己的自私和资产阶级倾向的战士；还有那未采取措施改正弱点的人，将会无法抵抗酷刑，不管他对斗争有多少信心。

习惯自欺欺人、未能以革命诚实面对自身过失甚至欺骗自己的人，最可能沦为叛徒，因为谎言正是背叛的开端。

¹²无痕计划注：贝赫鲁兹·德赫加尼（1939-1971）是阿什拉夫·德赫加尼的哥哥，同时也是 OIPFG 的成员。阿什拉夫在监狱被折磨时，贝赫鲁兹被逮捕，在在酷刑下死去但没有向施刑者透露任何敏感情报。



阿什拉夫·德赫加尼，1970 年代

“对我而言，践行‘萨穆德’就是存在本身”

以下无题证词由巴勒斯坦人里亚德分享，并收录于约旦河西岸伯利恒大学学者莉娜·梅里 2014 年论文《萨穆德：殖民监狱中的巴勒斯坦抗争哲学》英文版。

自殖民计划启动之初，以色列国便惯常对被俘巴勒斯坦人实施酷刑。1960 年代末，“萨穆德”（源于阿拉伯语 “ṣumūd”，意为“坚韧不拔”）作为文化价值与抵抗殖民占领的策略，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应运而生。此后数十年间，正如本证词所示，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将“萨穆德”精神运用于抗击酷刑。

尽管“萨穆德”是巴勒斯坦民族特有的精神，我们相信“萨穆德”核心的归属感可在其他社群中发掘或培育，无政府主义者尤其能从“萨穆德”中汲取灵感，发展出独特的文化政治价值体系，助力同志们抵抗国家暴力。

1991年，为躲避逮捕隐秘六个月后，我前往探望父母。占领军前来逮捕我，我在逃跑时受伤。照例，车上又开始了殴打和辱骂。当时我正研读《Falsafat al-muwajaha》¹³等著作，思绪飘向“萨穆德”精神。在审讯中心，我不断在“沙巴赫”¹⁴与审讯室之间穿梭。他们施展各种手段[……]剥夺饮食睡眠、储物柜、冰箱、强力摇晃[……]他们将我父亲带到审讯室，并威胁要带我母亲来。十二名审讯员轮番审问我。[……]每次审讯中，我都在构思践行“萨穆德”的策略。我所说的审讯中的“萨穆德”，是指集体精神、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信念、真诚与忠诚、归属感、自信心，以及在漫长岁月里滋养自我的力量。在漫长的审讯与酷刑中，我将“萨穆德”视为守护母亲与他人母亲的盾牌。我时刻铭记烈士、囚徒与“萨穆德”中的巴勒斯坦同胞。我思念烈士易卜拉欣·拉伊¹⁵，不断吟唱萨布琳乐团的歌曲。我深爱着一位姑娘，相信唯有践行“萨穆德”才能配得上她的爱。对我而言，践行“萨穆德”即是存在。

¹³无痕计划注：《Falsafat al-muwajaha wara' al-qudban》（《在监狱里的抗争哲学》）是个手册，描述以色列安全总局（以沙巴克或辛贝特更出名）的审讯手段以及如何使用萨穆德的践行来克服这些手段。1978年在监狱中由马哈茂德·法努恩执笔，后来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一个巴勒斯坦马克思主义组织，分发。

¹⁴无痕计划注：一种酷刑手段，将目标人以极为痛苦的姿势捆绑起来。

¹⁵无痕计划注：一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1988年在以色列监狱之中的酷刑之下死去。

冷热交织

下文节选自《颠覆人生：马科斯统治时期的家族回忆录》中“冷热交织”一章，该书由金波家族成员共同撰写，记录了他们从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在菲律宾反抗马科斯独裁统治的历程。

本章由内森·吉尔伯特·金波执笔，详述了他 1976 年遭军方逮捕和遭受酷刑的经历。内森时任菲律宾共产党（CPP）成员，该地下革命组织致力于对抗独裁统治。被捕前一个月，内森刚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迁至宿务市，奉 CPP 之命开展“宣传与文化工作”。他在朗贡居民区的藏匿点或安全屋与 CPP 同志——拉尼、厄尼、伊芙琳——共同生活。

我们认为本文是向施虐者提供虚假、无用、误导性或不完整信息做法的典型案例——既揭示其潜在风险——也展现可能带来的益处。需注意的是，尽管文中描述的酷刑手段极其残暴，内森在 2019 年接受鸭嘴兽联盟社团采访时坦言，自己遭受的折磨“与其他活动家的遭遇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1

[……]

“跟我们走！”其中一人拽住我的手臂用力一扭，随即给我戴上手铐。那群人把我推搡着往门口挤去。[……]

他们戴着手铐把我带到户外，穿过大学校园来到繁忙的街道。光天化日之下，绑匪们若无其事地招手拦下出租车。我被塞进后座，蒙着眼睛夹在两名男子中间，还被命令低头低头，把脑袋顶在膝盖上。

摘下眼罩时，我发现自己被铐在看似普通教室的课桌椅上，看到讲台椅、课桌椅，前墙挂着黑板。唯一显得格格不入的是堆在角落的木板。除绑匪外，几名便衣人员进进出出。他们搜查了我的身体。身上除衣物外仅有零用钱。连钱包和 cedula [身份证件] 都没有。他们采集了我的指纹，让我填写表格。

我填写了虚假信息。姓名？莱昂纳多·布恩苏塞索。[……] 住址？马尼拉圣米格尔区圣贝达小区第二街 542 号。多年前我们家住在第二街 538 号。542 号根本不存在。

填写表格时，我构思着审讯时的说辞。我的掩护故事是参与教会研究项目，调查维萨亚斯地区¹⁶学生的宗教与社会生活。刚抵达宿务，不久就要离开。是的，我会告诉他们我 9 月 20 日抵达，而非 9 月 8 日。这样若需交代在宿务的行踪，只需编造过去三周的故事。如同上次被捕时那样，我会暂时隐瞒真实身份以争取时间。同时决定不透露自己曾是政治犯的身份。

为缓解紧张情绪并拖延审讯，我应允与两名男子下西洋棋。近一小时后午餐送达——米饭配肉菜的正经饭食。尽管心绪不宁，我仍细细品味着米饭，毕竟过去一个月我和卡萨马 [同志] 们为省钱只吃玉米粉。

随后进入审讯环节。房间里的男人们如连珠炮般向我发问。

“你真的叫这个名字——莱昂纳多·布恩苏塞索？”

“是的。”

¹⁶无痕计划注：维萨亚斯地区是菲律宾群岛中央部分的地理区域。宿务市地处维萨亚斯地区。

“是的，先生。”

“是的，先生。”

“简称莱奥？”

“是的……先生。”

“你住哪里？”

“圣贝达小区第二街 542 号。我已经写在您给我的表格上了……先生。”

“但这是马尼拉的地址。你在宿务的住址呢？”

“我不住在这里。只是来做几周研究。”

“研究啊？你现在住哪儿？”

偏偏忘了准备宿务的地址。一时想不出——去过的都是卡萨马或盟友的家。“啊——天景酒店，”我终于脱口而出。

“天景酒店？你住得起天景酒店？房间号是多少？”

“记不清了，先生。”

“你真住在那儿？该知道，这很容易查证。登记时用的什么名字？”

“莱昂纳多·布恩苏塞索。”

“联系天景酒店，”那位看似负责的男子指挥年轻探员。

完蛋了，我暗自哀叹。这次再也无法搪塞过去。

几分钟后探员返回。天景酒店没有登记过莱昂纳多·布恩苏塞索。我无法描述天景酒店大堂和房间的样貌来佐证我的说法，毕竟我从未踏进过这家酒店。

特工们逼问我在宿务的真实住址。我坚持说天景酒店，要么就保持沉默，毕竟实在想不出其他地址。他们继续追问——何时以及如何加入运动和 CPP 的、谁招募了我、我的同事是谁。编造我在马尼拉的政治活动倒不难。只需提及戒严令前在 KM-Ateneo¹⁷ 的经历，坚

¹⁷ 无痕计划注：Kabataang Makabayan (KM) 是菲律宾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1972 年，总统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宣布戒严：组织被禁止，转入地下。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简称“雅典耀”）是地处奎松市，菲律宾人口最多的城市，的私立大学。KM-雅典耀是该大学的 KM 支部。在这一段，内森承认他在戒严之前对 KM-雅典耀的投入，也就是说，其被禁止之前。

称后来转学至 UP¹⁸ 便销声匿迹。我否认入过党¹⁹。被要求提供人名时，要么杜撰，要么提及已故的或曾被捕的卡萨马。真正让我陷入困境的是宿务，这个陌生的地方——何时抵达、去过哪些场所、执行什么任务、见过哪些人。当我拒绝回答时，审讯者扬言要殴打我。他们对不满意的回答反复追问，或不断重提旧问。被揭穿谎言后，我竟不敢鼓起勇气质问他们依据何种罪名拘押我。

审讯者拒绝相信我在宿务主要是在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做研究的说辞。他们也驳斥了我声称 9 月 20 日才抵达宿务的说法。他们显得越来越愤怒。当他们发现我拒绝配合且审讯毫无进展时，他们改变了策略。

2

冷热交替。卡萨马审讯术语中常有这两个用来描述战术性审讯的词出现。这意味着数小时的严酷殴打后，会出现短暂间歇。一位看似同情、言语温和的军官会驱散施虐者，单独与你交谈，劝你坦白以保全性命。如果你坚持沉默，整个过程便会循环往复，直至审讯者达成目的或厌倦这场游戏。

热。他们摘下我的眼镜，再次蒙住我的双眼。左手仍被铐在椅子上，约十二名男子开始对我施暴。砰！一块木板砸中头部，我痛呼出声。

“你在宿务住哪儿？哪儿？”沙哑嗓音厉声喝问。

砰！后背又挨一击。我惊恐地意识到那些摆放错位的木板用途何在。

“你住哪儿？”

他们拳脚并用，猛击我的面部，用空手道劈掌砍向我的肩膀，踢打我的双腿。

“什么时候来的？”

“来这儿执行什么任务？”

“你是 CPP 党员吗？”

“住哪儿？”

¹⁸无痕计划注：菲律宾大学（UP）是菲律宾的国立大学。

¹⁹无痕计划注：所谓的“党”在指 CPP。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挨揍。每次被打，我都痛得嚎叫。我拼命挣扎，但左手仍被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当我挥舞右手时，手表砸到某人身上。他们一把扯下表。我哀求道：“求求你们停手。可怜可怜我吧！我贫血啊。”这话并非实情。我只是想让他们停手。体重不足百磅的我，贫血倒也说得通。

见我仍不屈服，他们剥光我的衣服，将一根通电的线，可能是电话线，抵住我的生殖器和大腿。我尖叫起来。他们继续殴打我。当我再次喊叫时，他们塞了块布进我嘴里。他们继续施暴。“还不说？”其中一人问。更多拳脚。同样的问题。更多……

最终我点头了。他们解开蒙眼布，又扯掉堵住我嘴巴的布，才看清那竟是我的内裤。我抽泣着告诉他们身份，曾在伊皮尔²⁰被拘留，兄弟都是前在押人员，妹妹正在服刑。我解释自己申请调往宿务工作是因为在马尼拉已被军方盯上。我承认是菲律宾共产党候补党员。当被问及入党推荐人时，我提到了比尔·贝格²¹，却未提及他已遇害。在抽泣间，我努力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供述。我提供的信息对审讯者尚属新知，但金波逮捕拘留行动²²的全部细节早已载入军方档案。实际上我并未泄露任何敏感战术情报。然而审讯者很快识破我的策略，再度逼问宿务住址。

冷。这次他们没有殴打我，而是改用花言巧语。“你为什么不配合我们？”一位看起来像父亲的探员说着，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我们不想这样对待你。”他们解开了手铐，允许我穿上衣服。他们把眼镜和手表还给我。更多“建议”的话语。随后他们端来 merienda [点心]——饼干和可乐。待我吃完，桌上突然出现纸笔，命令我详述抵达宿务后的行踪，列出接触人员的姓名和特征，标注所有去过的地点——否则后果自负。

我明白这些人除非得到我在宿务的住址，否则不会罢休。但透露拉邦贡的住所绝无可能——若我这么做，拉妮、厄尼、伊芙琳和其他卡萨马必遭捕杀。我能提供什么地址？要是能找到明显与政治无关

²⁰无痕计划注：内森曾经被拘留在“伊皮尔接待中心”，戒严期间关政治犯最大的监狱。

²¹无痕计划注：KM 的活动家。

²²无痕计划注：金波是内森的姓氏。“金波逮捕拘留行动”是指在指内森刚给施刑者的情报。

的人家，或是废弃的邮局²³，或是空置房屋就好了。可我脑中一片空白。突然想到我的被捕必然导致拉邦贡的住所被弃用。现在不能透露地址——必须给卡萨马们足够时间撤离。同志们的惯例是：UG [地下安全屋] 必须在任何曾在此处的人被捕后 24 小时内弃用。卡萨马们直到傍晚，我未归时，才会意识到我已被捕。为确保他们有充足逃离时间，我必须忍受酷刑并拖延至次日晚间。我能撑那么久吗？热。那些人又回来了。我面前的纸上什么也没写。他们暴跳如雷。把我转到更小的房间。殴打以更猛烈的强度继续。我被迫长时间站立，手铐被解开，但仍蒙着眼睛，且被剥得一丝不挂。除了对我身体猛击和掌掴，他们还把我的头撞向水泥墙，用枪托猛击我的手背。多次遭受重击后，我跟踉倒地，痛苦地呻吟。

我放弃了关于天景酒店的杜撰故事，却想不出其他说法。除了逼问住址，施刑者不断追问我何时抵达宿务。他们坚称我谎报了入境日期。我坚持说是 9 月 20 日。最后他们亮出一张照片，清晰拍下了我和另外三名卡萨马成员。我们正从一条小路走向看似主干道的街道。照片显然是从马路对面二楼拍摄的。没错，我认出了地点——卡巴胡格²⁴！那正是我跟拉尼第一次被介绍的地点。这个会合点显然已被军方掌握多时。我努力回想那次会面的具体时间。照片拍摄日期应是 9 月 18 日，比我声称抵达宿务的日期早了两天。难怪施刑者们拒绝相信我 9 月 20 日抵达的说法。

承认 9 月 20 日的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后，我坦白了真实抵达日期，9 月 8 日，甚至提供了乘船名称“宿务市号”及当时使用的假名。但我强调自己是独自前来的，抵达后才遇见宿务的卡萨马，此后他们便一直照料我。

“码头接你的人是谁？”沙哑嗓音问道。他似乎是主要审讯者。

“卡永，照片里那个人。”虽然罗德也在照片里，我却指向了记不清名字的另一人。心念一转，打不过，就糊弄过去。

“照片里其他是谁？”

“不清楚，先生。我只在那次聚会见过他们一次。”

²³无痕计划注：“邮局”是“安全的会合地点和敏感文档和信件的交付地点”。

²⁴无痕计划注：卡巴胡格是宿务市的“邮局”（安全屋）。

我编造的新说辞是自己被辗转安置在不同住所，外出时总有卡萨马随行，独自一人根本无法辨认去过的房子。审讯者逼我描述所有提及的住所及屋内遇见的人。为验证我是否杜撰人物，他们每隔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就让我重新描述某人。总体而言我保持了前后一致。诀窍是选个真实人物，比如马尼拉某个不涉政的朋友，稍改其名后，进行描述。

“你见过托尼·T吗？”

“不记得见过这个名字的人。”

“他化名德里奥。”他们递来一张照片。尽管画面模糊，我确信这就是在宿务为我安排任务的人，两年前进洛约拉高地²⁵见过面的同一个人。

“没见过，先生。”我面不改色地回答。

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审讯者仍未能逼出我在宿务的住址。“总有办法弄到的，”其中一人发誓道。“夜还长着呢。”

3

他们给我上了晚饭。担心再挨打会消化不良呕吐，我只吃了几口。但喝了不少——那场折磨让我汗流浹背。

晚饭后不久，第三轮审讯开始。那些人浑身酒气，说话粗鲁。我的不安加剧了。他们还能控制住自己吗？

即便经历六小时的拷问折磨，我仍未向审讯者透露任何真正有战术价值的情报。我察觉他们心知肚明，更因被我戏弄而愤懑。尽管如此，我仍复述了第二轮审讯时编造的故事。再次被蒙住双眼、剥得精光。殴打重启。由于他们再也找不到故事中的矛盾或重大漏洞，我坚持着新编的版本。我的掩护故事站得住脚——除了宿务的地址。很快，施暴者将审讯焦点完全集中在此处。这是他们唯一能加以战术利用的线索。我察觉到他们此刻正与时间赛跑。他们深知若不能立刻逼出地址，藏身于此的其他卡萨马便能逃脱。

²⁵无痕计划注：奎松市的行政区。

“砰！砰！”部分拳脚落在了我的下肋骨上。这次殴打比第二轮更猛烈更持久。我多次倒地，但每次都被拽起来继续遭受拳打脚踢和空手道劈掌。最痛的是他们将我的头撞向墙壁。我以为自己会昏过去。尽管我已精疲力竭，他们仍持续施暴数小时不作停歇。

“要不要像对付你战友那样给你注射‘吐真剂’？”沙哑嗓音威胁道。“它能逼你吐实话。我们其实不愿动用这招，毕竟会造成永久性心理创伤，甚至可能让你疯掉。”

我从其他囚犯口中听说过吐真剂。它并非强迫人说真话，只是让人变得喋喋不休，更容易说出那些本该守口如瓶的事。有时确实会造成永久性心理创伤。

“不，求求你们。不，先生。”

“那你最好告诉我们藏身之处。”

殴打仍在继续。他们为何不停止？我感觉自己已濒临崩溃边缘；我再也承受不住这些打击。明晚似乎遥不可及，宛如永恒。这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假装他们已攻垮我，编造一个宿务地址？这样行得通吗？他们不会要求我描述房子的内外细节吧？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一试。我已走投无路。

“雅可沙莱姆 1-4-8 号！”他们继续殴打时我喊道。据我所知，雅可沙莱姆是条长街，以住宅区为主但也有商业设施。我祈祷 148 号是民宅，非商铺，这样故事才显得可信。

“住手！住手！”沙哑嗓音喝止。殴打戛然而止。然后，他靠近我身旁，再问：“你说什么？”

“雅科萨勒姆 1-4-8 号，先生。”我嚎啕大哭，彻底崩溃。他们扯下蒙眼布。泪水如泉涌出。多么戏剧性！小学和中学时我参演过许多话剧，甚至获得过几次表演奖，但校园剧场与此刻上演的剧本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才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表演。

奏效了！以为终于折服了我，那些人懒得询问 148 号的具体描述，反而用他们惯用的虚伪方式安慰道：“别哭了。你的折磨结束了，可以休息了。看吧，若早些配合我们，就不会受这么多苦。”

我讨了水喝，他们给了我一杯水和一瓶装满水的家庭装可乐瓶。我一口气喝光整瓶水。浑身黏腻难耐，我请求洗漱。他们慷慨地允许我淋浴。我用手帕擦干身体，反复拧出水分。当他们把我铐在小房

间的床上时，已近凌晨四点。想到这些人稍后发现我报了假地址会对我做什么，我不免心生不安。辗转良久才终于睡去。

4

那天和次日都没有关于 148 号的消息。他们不太可能突袭了那里——要是突袭了，我怕是要再当一次出气筒。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已将那里置于监视之下。

我仔细检查了他们施加的虐待痕迹：头顶几处肿块，嘴唇与脸颊麻木，左腕附近淤青肿胀，全身多处瘀伤疼痛。所幸没有骨折，生殖器未留痕迹，没有永久性毁容。我的脑袋还完好无损。我推断施虐者必定刻意避免造成永久性损伤或留下明显伤痕。以我瘦弱的体格，胸口若遭重击本应断裂数根肋骨。后来其中一人竟声称他们的拳脚都分寸得当。

[……]

5

沙哑嗓音的人冲进房间。他的脸色涨得通红。“你骗了我们！”他怒吼道。“你给的地址是假的！”

“什——什么意思？”我装作一头雾水。

“你报的地址——雅科萨勒姆 148 号——那是家诊所，牙科诊所。根本没人住。现在最好老实交代真实地址否则我们非把你打得半死不可！”

他不等我回答。他狠狠扇了我一记耳光，接着又朝我腹部猛捶一拳。其他男人涌进来加入殴打。他们开始粗心大意——竟忘了给我蒙眼。

“拉邦贡，”我平静地说，“是拉邦贡的一栋房子。”

他们停下了殴打。“门牌号？”其中一人怀疑地问，同时向我展示紧握的拳头。

²⁶无痕计划注：在菲律宾为公共交通使用的吉普车。

“没有门牌号。那里的房子都不编号。你们坐集尼車²⁶的话，在圣伊西德罗的 capilla [小教堂] 拐角处下车。过桥后第六栋房子，右侧，紧挨着一家 sari-sari 店 [小杂货店]。”

他们让我详细描述屋子内外。我照做了。他们似乎终于相信我说实话了。几分钟的盘问和听我描述后，他们匆匆离开房间。看起来他们当晚就要发动突袭。不过他们肯定会一无所获。我瞥了眼手表暗自盘算。被捕至今已逾 78 小时。随即又忧心忡忡。万一卡萨马违反安保规定，仍未撤离那栋房子呢？

当晚杳无音讯。次日亦无动静。但无消息或许就是好消息——没有新的逮捕行动。

被捕第五天，他们放进一个秃顶中年男子，提着医生包挂着听诊器。他草草检查了我。酷刑留下的痕迹虽已消退却仍清晰可见，他对此只字未提。他问我是否贫血。或许我的贫血说辞终究奏效了，让那些人收敛了拳脚的力度。我点头。他检查了我的指甲，又掀开我的眼皮。“没有贫血，”他断言。医生离开。之后我再未见过任何医疗证明。我猜审讯者只是想确认他们的拳头没在我身上留下永久印记。

审讯者们打出一份供词，声称我参与颠覆活动。他们逼我读完并签字。这份供词荒谬地自相矛盾，包含我杜撰的内容，包括雅科萨莱姆和拉邦贡的故事。[……] 我签了字。日后要推翻一切都轻而易举。[……]



内森・吉尔伯特・金波，2009 年

为何我们处决了姆潘帕利斯

本文节选自希腊革命组织“1978年6月”于1979年刺杀彼得罗斯·姆潘帕利斯后发布的公报。

彼得罗斯·姆潘帕利斯曾在希腊1967至1974年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担任酷刑施虐者及警察。独裁政权垮台后，因其对政治犯实施酷刑，姆潘帕利斯被判处18个月监禁。1978年6月组织很可能隶属于“11月17日革命组织”——一个希腊城市游击组织。

我们分享此文，作为革命者通过物理消灭施虐者来反抗国家酷刑的（众多）案例之一。

截至今日，可憎的酷刑施虐者、警察佩特罗斯·姆潘帕利斯已不复存在。他被一队战士处决。其为人行径众所周知。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他的恶行与恶名早已超越希腊国界。

作为镇压力量的首脑之一，他执掌着阿斯法莱亚²⁷的迫害机器。他以极端残暴的手段打击反抗军政府及其背后的体制的战士。

他主导着阿斯法莱亚的恐怖统治。他对成千上万民众实施骇人听闻的酷刑。他摧毁了数百名战士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不仅如此，凡是因任何缘由落入阿斯法莱亚之手者皆难逃厄运。他一手“扶植”数百名线人成为精英酷刑执行者，其中许多人至今仍在继续作恶，正日益成为资本家统治集团国家机器的核心支柱。

[……]

因此，我们，作为我国人民革命运动力量中的一支战斗队伍，决定处决佩特罗斯·姆潘帕利斯：

- 因其身为阿斯法莱亚臭名昭著的酷刑施虐者与警察，必须为无数罪行付出代价；
- 因为他即便在结束酷刑行径后，仍持续充当政权针对无产阶级的“非正式”镇压与恐怖机器的重要工具及自觉参与者；
- 因为通过他及其行径，资本主义权力体系的暴力与压迫实现了特定的“代表功能”。

这种“代表功能”是维系剥削与压迫的具体而持续的实践，绝非抽象的“制度”。我们将以具体而持久的斗争对抗这种暴力与滥权行径，而非模糊的宣言与抗议，因事实证明，后者不仅毫无助益，更会分散注意力、安抚人心，削弱一切斗争的意愿与决心。

[……]

发展对抗政权恐怖统治与资本家的剥削的人民暴力革命

以一切手段打击警察及其支持机构

唯有通过人民革命斗争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斗争仍在继续

²⁷无痕计划注：阿斯法莱亚（Ασφαλεια），可译为“保安”，是在指军政府统治时期的警察部队，因残暴行为被恨。

“但谁配活着？”

以下文字摘自阿尔弗雷多·博南诺 2013 年出版的意大利语著作《L'ospite inatteso》（《不速之客》）。

阿尔弗雷多·博南诺（1937–2023）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起义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他毕生通过文字与行动践行理想。他曾多次遭监禁酷刑，而本书成书于 2010 年，当时他因涉嫌银行抢劫案在希腊服刑期间完成创作。在《不速之客》中，阿尔弗雷多详述了 1970 年代其亲身参与的全球各地暗杀酷刑施虐者、告密者、叛徒及其他国家镇压机器代理人的行动：在希腊对抗军事独裁政权，在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殖民统治，在北爱尔兰打击英国殖民势力。贯穿全书的“不速之客”意象，象征着毫无预兆降临的死亡，也就是阿尔弗雷多及其战友在执行暗杀任务时所扮演的角色。

在回忆北爱尔兰行动的这段文字中，阿尔弗雷多对过往行为产生了质疑，并尝试对杀害酷刑施虐者等国家“魔物”的行为进行伦理审视。

我常发现不速之客就在身旁。在工作中遇见它永远无法习惯。碾碎、根除、摧毁生命，便是它的存在方式，一种无人渴求的不速存在，如同令人厌恶却又不得不为之的卑劣正义。参与其中需要充分准备，并非技术层面——那反而是最不需担忧的——而是个人的、私密的、道德的层面。它的存在既令人不安又充满魅力。片刻之前还是鲜活生灵的存在，饱含生命力，能憎恨、能爱慕、能期待、能繁衍，未来本可赋予他无限可能，却因邂逅这位不速之客，骤然丧失一切能力；他横卧地面，被碾得粉碎，如同断线的木偶，一块旧布，一团静止的血肉，数日后便将开始腐烂。这股善恶交织的爆发力去了何方？它化作烟消云散，被不速之客攫走带走。

[……]

少了一个魔物。多少酷刑得以避免？类似我亲身承受的，以及那些素未谋面的他人所受的。这等魔物不配活着。值得深思的判决。但谁配活着？行为端正者。可何为行为端正？遵守规则？免于酷刑。数百年监禁、合法处决与种种刑罚。这算守善吗？手持法官签字的纸条杀人者，真比奉命施刑杀人者责任更轻？得了吧，认真点。若真认真起来，活人所剩无几。界限何在？谁来划定界限？界限清晰吗？抑或随意勾勒，稍有偏差，此人便在界内，彼人便在界外？当探讨其极端后果时，这便成了棘手的议题。谁来裁决？谁来执行？[……]这种彻底的割裂[……]不仅消除了人类的恶魔——唯有人类能如此凶恶——更是扼杀了所有批判性思考。所有问题都悬而未决。

即便在我们组织内部，也有人坚信自身行为的正当性，有人心存疑虑。[……]某些人类、某些任务、某些国家机构，或是赏金猎人与雇佣杀手所展现的凶恶，难道不该不惜代价连根铲除吗？不惜代价？当然，代价评估始终不可或缺。切勿凶恶地杀戮魔物，无异于代替他们，甚至加倍屠戮。故需明辨是非。在地下斗争的炽热中，这种明辨是否难以企及？在外国军队占领的国度行动时，是否难以实现？或许吧。抑或存在未曾考虑的替代方案？更注重情报分析？更精准谨慎地选择目标？我们是否时常冒着攻击最软目标的风险？某些行动是否只是为了在胸前再添一道象征性的勋章？我不得而知。我并非断言事实确是如此，而是坦言自己多年心存的疑虑。作为秘密作战单位，我们必须展现存在迹象。行动、持续核查比对、实施任务、召唤意外之客。秘密作战单位还能做什么？咬指甲吗？但究竟是谁赋予了不速之客那份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份我们历经艰辛才托付给他

的权力？绝非都柏林²⁸运动组织提供的信息，那些情报几乎仅限于背景资料、地点简述和零星照片，非有系统地附带罪犯的犯罪履历。难道是我们通过严谨的双重核查、数日乃至数周的观察，将罪犯的凶恶行为与自身认定等同，从而自行授予了这种权力？我认为并非如此。[……]真正的授权源于我们确信眼前这头魔物不配属于人类共同体，而我们都属于其的一部分，不仅包含我这样的解放者，也囊括奴隶乃至那些通过剥削奴隶劳动让世界行动的统治者。那么，这个魔物必须被呈现在不速之客面前因为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已将自己置于这个共同体之外。这是面对不可理解之事时，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²⁸无痕计划注：爱尔兰的首都。设在都柏林的抵抗运动是阿尔弗雷多与战友的目标消息来源。

“这是一场冷酷的欢迎”

以下内容摘自约翰·吉布勒所著《被世界撕裂：游击队员逃离墨西哥秘密监狱实录》，于2018年以英文出版（西班牙文版首版于2014年发行）。

本书讲述了墨西哥游击组织 Ejército Popular Revolucionario (EPR，人民革命军) 成员安德烈斯·特索帕斯特莱·特克皮莱被捕、遭受酷刑及最终逃脱的经历。1996年，安德烈斯遭墨西哥军方逮捕后被强迫失踪：他被关押在秘密拘留所，与外界完全隔绝，当局始终否认其被捕事实²⁹。安德烈斯遭受殴打、电击及强奸威胁等残暴酷刑，却始终未向施虐者透露任何敏感情报。历经数月折磨后他成功逃离拘禁场所重获自由。数年后约翰·吉布勒在安德烈斯隐匿期间对其进行了多次访谈。本书即基于这些访谈内容撰写。

此处所述事件发生于安德烈斯逃脱数日后。他成功联络到 EPR 的战友，对方派人接应将其带至藏匿点或安全屋与组织指挥官会面。安德烈斯描述了这场艰难的重逢，此中战友们对其逃脱拘留所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担忧他可能已被墨西哥军方“策反”沦为双面间谍。下划线部分为访谈原话，其余内容由约翰·吉布勒根据访谈整理撰写。

我们认为安德烈斯的证词引发了关于信任、同志情谊的复杂思考，更触及如何接纳遭受酷刑的同志重返组织的问题。

²⁹无痕计划注：强迫失踪随后被强迫失踪的人的谋杀当时在墨西哥被墨西哥武装部队和其他国家机构运行，近年变得更普遍：在2006年至2025年期间预计数万平民被国家强迫失踪。

有人来接你。他们带你去一座大城市。他们笨拙地用化妆品和假发给你伪装。在车上他们以惯有的冷漠和猜忌对待你。这是一致冷酷的欢迎。仿佛他们早就说出了这句话：“你说什么我们也不信。”

你抵达那个屋子。猜当时守候的人会如何迎接你？拥抱？欢欣，抑或猜忌？你无从想象。只知必须坦白一切。

墨西哥谷的[EPR]指挥官，奥斯卡和文森特，在此现身。首轮审讯因猜疑而显得格外严苛：“你告发了谁？你用多少钱赎回了自由？”

初始阶段你没有作任何抗争。不插话，不辩驳。有时甚至无法开口。尽管这正是你渴望的：渴望有人倾听。但此处的氛围截然不同。不仅是可理解的猜疑，连审讯的节奏与语调都不同。你开始重温曾经的一切……

随后负责分析你的专家到来，他们将判定你的言辞真伪。他们带你去见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他们把大量的药物灌下你。还有审讯……你渴望倾诉，他们却将其转化为盘问。仿佛他们将你从现场拽出后……我是说……不，不……他们给你拍全身X光片，三十多张，只为确认体内是否植入微芯片。比起关心你的健康状况，他们更在乎调查你是否“被跟踪”。

他们宣称：“你身上没有明显伤痕。看起来也没挨过多少打。我们就是找不到证据。”

人们常说酷刑幸存者脱离囚禁时往往浑身是血、肢体残缺，拖着一身烂肉在地板上爬行。这些人不明白，施刑者凭借其魔鬼般的、非人道的手段，早已将酷刑技艺臻于完美。这已非中世纪的刑罚。不。某些施加痛苦的方式从未改变……如今他们能用毛毯裹住你，用棒球棍击打而不留痕迹。他们能让你关节脱臼，却不必像中世纪那样将你绑在马背上。

尽管如此，你并不怨恨战友们。你没有仇恨。但你清楚他们无法理解这种伤害的程度，肉体对灵魂的殉难。他们缺乏这种深刻的良知。

[……] 但你渴望他们倾听；你渴望诉说、诉说、诉说。可他们对你的每句话都挑刺。当你讲述经历时，他们总打断道：“不，你搞错了。感觉不是那样。感觉是这样。”而你心底始终萦绕着同一个问题：你们可曾身临其境？他们告诉你：“不，他们没想杀你。他们只是想吓唬你。”而你只想着：早说啊，混蛋们，我当时以为他们真要杀了我。

面对战友的冷漠与不信任，你心想：此刻我只想让亲历者发声。真相不该被掩埋。这不该由我或他们来诠释。它只是段经历。无数经历中的一段，没错，但唯有我能讲述这段。其他人无法说出他们的故事。或许他们再出现的时候会有办法。我所做的一切并非只为讲述，或是书写，这个故事。历经如此苦难、如此猜疑、如此否认之后……我毫不在意。我毫不在意，也无意辩解。为什么？因为不论说是这个或者那个，或是这场斗争，或是其他任何什么玩意……管他去死。我从来都不是那种人，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那不是我的梦想。这就是一个反抗者必须面对的现实：要么胜利，要么在每个层面、每个维度、每个举动中彻底完蛋。既然如此，我此刻便永远扮演反抗者的角色。我认同这个身份，别无他选。我别无选择。我根本不可能讲述这个故事。我更不可能宣告：“我就是”。唯一确定的是，我并非为某个人而战，而是为另一个世界而战，为人类及其面临的一切而战。这就是我的遭遇。这场斗争是对抗犯罪国家，对抗会谋杀的国家，对抗屠戮、强迫人失踪、杀人的国家。这很艰难。我创造、解构、拆解自己的形象。唯有我能掌控叙事方式以避免伤害。因为单纯为了讲述而讲述，不仅令人不适，更充满痛苦。我认为每次讲述时，总有新的事物浮现，现出那些隐匿的创伤，或创伤的永恒存在，抑或所有伤痕的愈合。

我不会强迫自己说服你。或许你会认同某些内容，或其中部分片段，或某一天的片段，或什么都不认同，或全盘接受。我无法预知。我只能承受。这是我理解的方式，说服他人并非我的职责。不该……不该由我来解释。我当然可以做到。是的，我可以回答你们这些荒谬的问题，容忍你们可笑的评论、种族歧视的评判³⁰、你们的傲慢，以及你们虚构不存在事物的妄想。我可以，但不，这同样不在我的梦想之中。

³⁰无痕计划注：安德烈斯是纳瓦人——墨西哥的原住民族群。关于“种族歧视的评判”，他在指他的指挥官无法相信一位从小村庄来的纳瓦男子会有本性承受他所通过的经验，或是以他所做的方式计划和贯彻逃脱。

后记

阿尔弗雷多·博南诺在《不速之客》中写道，权力“本身就蕴含着驱使它诉诸屠杀与酷刑的迫切性”。我们认为此言不虚。军事独裁政权必须惯常施以酷刑以确保自身存续。民主政权若尚未惯常施刑，一旦感受到足够威胁便会立即效仿。地下组织同样难逃此劫：纳森·吉尔伯特·昆波因加入菲律宾共产党遭军方酷刑折磨九年后，该党武装组织据称在一次大规模“清洗”中酷刑处决了至少 60 名同情者。因此我们主张，酷刑问题关乎所有渴望废除权威制度及其内在力量的人。

那么，该怎么做？

建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酷刑的首要步骤是在自身处境中评估酷刑的风险与实施方式，包括：

- 酷刑的筛选标准。被捕者是否遭受酷刑，可能取决于其涉嫌的罪名性质、政治立场或疑似政治立场，亦或其族裔、国籍、性别认同或表达、性取向、宗教信仰等因素。
- 酷刑的目的。尽管所有酷刑在某种程度上都旨在威慑受害者和／或第三方，但部分酷刑确系为逼供而实施，另一些则纯粹以制造恐怖为目的³¹。
- 酷刑的手段。手段选择取决于施刑者所奉的指令和其惯例，以及其是否有意在受害者身上留下永久性酷刑痕迹以及／或致其死亡。
- 酷刑的持续时间。酷刑可能仅限于逮捕瞬间，或集中发生于拘留初期数小时至数日，亦可能持续数周、数月乃至数年。

无政府主义者可据此评估制定个体与集体策略，例如：

- 强调安全原则像是划分方式和“需知”原则。同志知道的敏感信息应尽可能减少，使施虐者难以获取可利用的情报。
- 建立能确保在同志被捕后能迅速获知消息的通讯协议，以便立即采取行动：

³¹ 无痕计划注：例如，土耳其迪亚巴克尔监狱在 1980 年代中期有系统性的酷刑企图恐吓库尔德人，更远大的目标是消灭库尔德人的认同。

- 保护被捕同志。在酷刑仅限于拘留初期阶段的特定情境下，逮捕后尽快向当局施压（例如通过律师或记者介入），可能有助于制止酷刑或减轻其严重程度。
- 保护尚未被捕的同志，以防被捕同志“开口”。具体措施取决于被捕同志掌握的信息量，可能包括放弃安全屋、中止行动计划、或隐姓埋名转入地下活动等。
- 做好心理准备抵抗酷刑。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提供经验证实的准备技巧，仅希望本手册分享的见解能有所助益。

随后便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何对待那些在获释后遭受酷刑的同志，无论他们承认还是否认在酷刑下“开口”，无论我们是否相信他们。德米特里·彼得罗夫写道，那些开口的人“几乎不可能继续成为我们的同志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安德烈斯·佐姆帕斯特尔·特克皮莱则揭示：当处境危急时，即使未供认也可能不足以保全，战友们仍可能不相信你。我们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我们愿意提出质疑。能否采取更细致的处理方式？能否在艰难情况下，让酷刑受害者参与其中，对每个案例进行伦理评估？能否给予第二次机会？当我们难以辨明真相时，能否在暂缓信任战友的同时继续陪伴他们，帮助他们疗愈伤痛和心理创伤，即便他们暂时或永久地被排除在我们的行动之外？敌人通过酷刑企图摧毁并孤立我们。如果我们能直面这些问题，岂不是更有助于避免这种毁灭与隔离、岂不是更接近覆灭敌人的目标？

在本合集序言中我们写道，酷刑是“是国家及其盟友在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战争中常用的手段之一”。我们使用“战争”一词绝非轻率，正是在此框架下，我们收录了将刺杀施虐者视为应对国家暴力特定形态的有效手段的文本。重申一次，我们没有现成答案。我们只能鼓励同志们在各种情境中运用最佳判断力，并希望本合集能帮助大家更清晰地认识当前议题。

在此分享伊拉克作家、画家兼革命活动家海法·赞加纳的文字，摘自她记录政治迫害、酷刑与流亡经历的著作：

“悲伤是最初也是最终的归宿吗？是粉碎梦想的元素吗？痛苦啊，请退去吧，让人在梦境森林中徜徉。走廊尽头站着女孩，她向太阳倾诉对黑暗的恐惧，举起手指恳求我们每个人：难道不该让希望重拾些许荣光了吗？”

— 海法·赞加纳《梦中的巴格达》，2009 年

愿力量与勇气永伴天下友伴，
无痕计划

酷刑—即为惩罚、审讯或恐吓而蓄意施加的剧痛或折磨—是国家及其盟友在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战争中常用的手段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应采取哪些个人与集体策略来防范、抵抗并反击酷刑？本文集旨在通过分享过去五十年间遭遇酷刑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其他激进派反抗者的经历与洞见，为解答此问题提供参考。



No Trace Project / 无痕，无案。这是一个工具合集，旨在帮助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反抗者了解敌人的能力，削弱其监控手段，并最终安全地采取行动，不被抓捕。

基于您的情况，持有某些文件可能被定为犯罪，或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请谨慎选择打印哪些小册子，以及将它们存放在哪里。